

## 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翻译家身份建构

罗 杰<sup>1,2</sup>

(1.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00; 2.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学界对楚图南作为翻译家的重要文化身份未作深入探讨。其实, 楚图南是一位具有外国文学译介实践和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实践主要表现为对德国尼采哲学思想、美国惠特曼民主自由思想、俄国文学民主主义精神、古希腊人性自由观念等四类外国文学的译介, 译介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行为呈现其翻译思想。从其译介活动的勾勒、译介文本选择、翻译思想等视角探讨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 建构其“译者之心”“智者之思”“师者之情”“学者之范”翻译家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 楚图南; 译介文本; 译介活动; 文化身份; 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 H315.9;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0) 05 - 0120 - 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5.019

###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by Chu Tunan and Hi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a Translator

LUO Jie<sup>1,2</sup>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63000;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Chu Tunan's important cultural identity, as a translator, is not academically researched in depth. In fact, Chu is a translator with both the practice of foreig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is mainly about four categor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cluding German Nietzsche's philosophy, Whitman's thought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spirit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concepts of human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his translation thought is represented according to his choices of translation texts. His cultural identity as a translator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features of a translator, a wise man, an educator and a scholar, with the discussion of his foreign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outline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 choices of the translation texts and his translation thought.

**Key words:** Chu Tunan; translation tex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ion thought

楚图南是一位学者型文化名人, 其既以中国“有为”传统文化为基础, 严谨地秉承融通“内省”的传统文化精神, 又是坚定着“良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方法论者。目前其重要的文化身份——翻译家, 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大致经历了从学习到创作、历经狱中精神磨难和精神指引的心理诉求、最终不忘独立人格的自由精神。对于翻译的本质见解、经久不衰的翻译作品、不断探索的翻译策略, 这些承载了楚图南的重要文化身份, 也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演变

一起建构起翻译家的身份。因此, 有必要对楚图南的译介活动和翻译思想进行深入探讨。

### 一、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

楚图南作为外国文学文化的译介者、传播者和吸纳者, 其译介活动与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其他 20 世纪的翻译家相似, 他也是从博览国外文学名著开始进行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发生于“文化建构”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跨界“他者”,

收稿日期: 2020 - 01 - 17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楚图南著述及其文学思想研究”(2019J0917)。

作者简介: 罗杰 (1980—), 男 (彝族), 云南广南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梳理其外国文学译介轨迹大致可呈现以下四个阶段。

#### （一）20世纪30年代

楚图南的求学生涯与外国文学是分不开的，从最初投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外文系的心愿未遂，到20世纪20年代初，楚图南因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哈尔滨狱中的日子让楚图南与英文书籍结缘，在狱中他不但博览了众多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布哈林等人的政治著作，并开始了外国文学译介。

在20世纪30年代初，楚图南获得英文书籍，并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查拉斯图如是说》（1931年5月）和《看哪，这人》（1932年9月）。楚图南正是在狱中、在军阀酷刑下的生存绝境中完成了对尼采作品的译介，实现了翻译外国文学的初衷，也借由尼采思想来开启民智和改变本民族的落后现状。

在20世纪30年代，楚图南除了译介尼采作品外，1935到1937年期间，还根据英文译本转译了民主主义革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抒情叙事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作家阿·塞利瓦诺斯基（A·selivanosky）的《苏俄的诗歌》。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真实书写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并以荷马史诗的审美精神来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楚图南怀着对理想国度的向往及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把这部作品翻译给中国青年。1937年7月，楚图南编译了受尼采影响的德国新浪漫派诗人德米尔的《德米尔诗抄》。

楚图南是在1930年前后开始翻译惠特曼的诗篇。由于楚图南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他从惠特曼身上看到了人类生命力和自由新生的清新气息，为此他节选了惠特曼部分诗作以《大路之歌》为题结集出版，这部译作旨在为时下青年带来一股年轻人应有的乐观向上的青春精神。

楚图南在这个时期的译介活动，明显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的影响，其译介选材比较倾向于从国家民族命运角度来思量作品精神，与同时代其他翻译家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一样有一定的“革命与反抗，积极与向上”的时代共性。

#### （二）20世纪40年代初

在1941年前后，楚图南感知到抗战时期的艰难氛围，希望通过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来传达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理念，于是陆续收集了俄国、德国、匈牙利等国家进步诗人的作品，表达对身处社会变革的思考。在昆明期间，他择取了俄国浪漫主义诗人莱蒙托夫和19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匈牙利诗人欧特瓦士和沙罗西，德国诗人陀劳尔、德米尔等进步诗人的十六首诗作进行译介，并以《枫叶集》为题名，于1944年在昆明由李公朴创办的北门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集结了经楚图南审慎选择的外国诗人的佳作，较集中地呈现出其追求展现时代风貌的译介特点，寄托了对人类情怀的向往，同时寓意着对中国青年的期盼。

#### （三）20世纪40年代末

楚图南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中影响较深远的是成书最晚《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他翻译此书的渊源是与中国另一位翻译家——郑振铎有关。1936年，郑振铎建议由楚图南来翻译完整的希腊神话。然而直到1946年，楚图南才有闲暇关注希腊神话，又历经两年时间寻找、筛选翻译文本，并最终在德国斯威布《神祇与英雄》的英文译本转译完稿。此间，楚图南带病奋笔疾书，使译稿于1949年6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译作传达了楚图南的文学思想，他以马克思历史唯物观为方法论开掘了希腊神话传说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重要“艺术武库”，为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参照。

#### （四）20世纪50—8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楚图南主要致力于外国文化的交流与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文化协会会长，担负着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和传达友好睦邻的文化使者。楚图南葆有初心，以其文化身份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在新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楚图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又焕发出新的生命。1955年，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提议，再版了《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

由》。楚图南结合国际政治时事搜集了大量资料后进行修改,又以俄文版本作为参照作了更合理的补译,遵照涅克拉索夫创作意图使之更符合原著精神。

20世纪50年代,《草叶集》(1955年)和《希腊的神话和传说》(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其后,楚图南秉持着审慎态度,收集资料并翻译出较为完整的《草叶集》,这个版本的译作给楚图南带来了更高的声誉。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尼采精神又契合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1986年,《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得以再版。楚图南认为:“重新介绍、评价尼采的作品和思想,以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扩大我们的学习视野,是不无裨益的。”<sup>[1]</sup>楚图南从历史唯物观角度来看待尼采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他认为对尼采的中国接受与评判应该持公允态度,不能因时代变迁而失去公正性,应当将之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认识与研究,方能得出较为客观的认知。

## 二、楚图南的译介文本选择与翻译思想

楚图南的学术素养决定了其在外国文学文本和作家选择上与其他翻译家的不同,其译介文本选择与翻译思想的形成主要基于两条学术脉络:一是学习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经由李大钊的指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科学学习马克思整体方法观。二是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基于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涵养,形成了扩宽青年朋友知识领域的翻译策略。在译介文本的选择上,其主要是从俄国、德国、匈牙利等的英文译本进行转译,在汉英语言之间架构起多民族文学作品价值。他善于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文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注重选择积极向上、主题鲜明的作品,以拓宽中国民众的阅读视野;在优秀作家作品的选择上,他善于宏观把握作家主题与表现形式多样的定位,多为书写“反抗精神、生活勇士、理想国度、精神探索者”方面的作家;在译本读者态度上,他对知识阶层及底层民众有着深厚关切。其翻译思想经由译介文本具体呈现,通过文本与作家的选择,可以窥探楚图南外国文学译

介的真实选择。

### (一) 尼采哲学精神成为翻译的价值指向

为何翻译,翻译为何?这是每个翻译家考虑翻译时必然的发问与认知,楚图南从事外国文学译介的动力源自他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信仰,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阶层往往会通过向内自省与向外借鉴途径来实现自我的精神信仰。楚图南通过向内自省认知到国内“启蒙”知识的匮乏、视野狭窄,转而从国外寻求拓宽青年知识视野的方法,即向外国优秀文学文化汲取养分。最初,他选择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作品进行学习和翻译,离不开他在狱中的命运困境和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其所翻译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正好体现了他译介文本的选择和翻译思想。楚图南在尼采的哲学精神中发掘出生存意义和时代内涵,他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出版时说:“我是扣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译下这书的。”<sup>[2]</sup>楚图南借由译介出版尼采的作品,传达出一个中国有超越意识知识阶层的心声,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诉求。尼采在其眼中代表了一种个体生命价值如何实现的精神指向,是反叛精神的象征。从楚图南的人生境遇和其翻译尼采作品的动机来看,更印证了尼采的超人精神正是他在人生绝望和理想幻灭时将他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精神动力。尼采的叛逆精神明确其既为译者为何翻译的目的性,又达到开启民众民智和教化互动的社会效应。

在楚图南眼中,尼采如同中国众多作家推崇的理想主义悲壮斗士堂吉珂德。为此,他也明确提出:“在中国,一切在变动之中,介绍和研究尼采,亦只能强调尼采对于时代的叛逆性、革命性乃至进步性即得。”<sup>[3]</sup>由此可见,尼采思想在楚图南的一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其从事外国文学译介的精神动力,是其为中国青年寻求的超人精神,为其译介文本指向改造社会和提供精神力量。尼采在楚图南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精神指引作用,特别是在特殊时期,作为自我拯救的内生动力鼓舞着其在困难面前不遗余力地捍卫真理和坚持自我。

### (二) 从《草叶集选》的译介实践中探寻新方法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楚图南最喜爱的诗人。楚图

南之所以会选择译介惠特曼的作品，是因为其翻译其作品时正处于抗战期间，楚图南深感中国民众急需一种强烈的精神来作为信仰支撑。为此他调整了既定的翻译方法，因惠特曼诗歌的主题永远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反抗，采用自由多样的诗歌形式来传达对生命的讴歌，暗合了中国民众对自由平等新生活的切盼之愿，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民众的期盼新生活的心理诉求的集体表征。

为了能够“信、雅、达”地翻译出惠特曼的诗歌精神，楚图南尝试通过对《草叶集选》的翻译探索出能更好、更准确、更传神地译诗的新方法。在《草叶集选》的翻译实践中，楚图南总结一种译诗的新方法，“对诗歌的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正确的态度是：在批判者求审慎，在翻译者要虚心”。<sup>[4]</sup>如何忠实地表达原作的他者文化精神，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需摆正自身在译介活动中的位置，继而是如何准确地将作者的思想传达出来，又能够被接受者很好的理解，努力与作者在文本上实现对话，这是译者必须把握的基本方法。楚图南在翻译新方法的基础上提升译介理念，既看到了惠特曼身处美国勃兴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也透视了惠特曼诗作品因过于旺盛的乐观主义多少蒙蔽了对美国社会的全面认知。因此，楚图南坚持在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忠实地呈现诗人的创作意识，体现了对他族文学文化差异性的认同与尊重，彰显出其在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秉持“真实”的翻译策略。

对此，译介家谢天振给予肯定：“楚图南在《译序》中对惠特曼其人其作极为推崇，指出惠特曼的诗歌‘不但在形式方面汪洋浩渺，创造了近代所有自由诗的新风格，为千载以来的诗坛开辟了自来少有天才敢于漫游或闯入的异域。’”<sup>[5]</sup>楚图南的译诗方法得到了肯定，不仅在于他准确地传达了惠特曼的诗性精神，更重要的是，完全诠释了楚图南全身心投入地将诗歌精神完整地传达给接受者的真切之心。

### （三）从希腊神话翻译中融通中西筱同文化精神

楚图南熟悉西方历史文化，又长于英语翻译，特别是他对西方文化史知识比较熟稔，且在马克思

历史唯物方法的指导下内化成自身文化体系的构成部分。《希腊神话与传说》的译介中体现了他“包容”的翻译思想和异质文化交流视野的前瞻性，他认为：“希腊的神话和与传说在人类文化教育上的价值以及对于文学、宗教、哲学、心理，乃至民俗、种族、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启示是无人能否认的，也是最不容易说得出来的。这在古代希腊是人类知识和教育的宝藏，在以后的欧洲和世界也正是文学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sup>[6]</sup>楚图南善于从他者文化中发现自我民族文化中可借鉴的文化精神，尽管他对译介文本采取审慎的态度，却能够把握住翻译文本的价值内涵。他严格遵守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这也是其翻译思想的特色之一。他在对希腊神话的翻译过程中，比照中国与希腊文化精神后融通了中西筱同的文化精神，推崇希腊神话中的人本自由思想，较早地倡导世界文学文化的国际交流。其译介思维拓展为多角度的文化转向，翻译思想由积极向善转换为世界民族文化和善寓意的提升。

### （四）从俄国文学翻译中坚定马克思恩格斯文学信念

楚图南对俄国文学的认知是不断深化的，他不仅翻译了民主主义革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而且还翻译了作家阿·塞利瓦诺斯基（A·selivanosky）的文学评论《苏俄的诗歌》。在对俄国文学的动态译介过程中，他倡导将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结合新文学运动，认为俄国文学中的“关注社会问题、人道主义和平民精神”值得学习，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解。他译介外国文学的初衷就是要让知识青年在学习国外优秀文化中能够树立起正确的唯物辩证观，这是其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要宗旨。他在《五四运动的启示——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感言》中反思：“五四运动前后，在知识青年中，存在着各种性质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各种不同旗号的政治派别，但历史的发展和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列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运动，才是改造社会、建立新世界的武器。”<sup>[7]</sup>不难看出，在回顾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中的作用时，楚图南一语中的地明确在众多纷繁的外国文学

中只有坚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才能将之运用到改造社会和建立新世界的思想武器。历史证明,楚图南在对俄国文学的译介过程中,不仅学习其文学中的精髓,心怀对“自由快乐”国度的向往,不是一味盲从追随,而是探寻符合国情的新兴进步文学思想,坚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信念。从五四时期作家的创作题材到思想层面受俄国文学影响来看,这条译介俄国文学的探寻之路,是中国知识阶层历经向俄苏借鉴后复归于本国文学人民性的心理诉求。同时,进一步说明译者与原作、译本之间的对话关系必然是建立在能动、双向的交互过程中,译者必然要根植于自我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与知识构成。可见,楚图南的译介文本选择彰显出文本对话较强的文化精神交流、较为开阔的视野。

楚图南的译介文本选择的精准多元,能为楚图南翻译思想提供新解。深入探讨楚图南文本选择中呈现的民族国家意识问题,能充实对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发展演变过程的认识。楚图南与20世纪中国社会民主革命及外国文学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当外国文学译介在20世纪中国社会活动中担当着重要作用时,楚图南的人生轨迹不能回避此间其接受他者文化的影响,究其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而言,足以作为翻译家深入研究。楚图南注重选择民主自由观念强、提升民众身心自由的作品,其翻译尼采、惠特曼、希腊神话等实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凸显其翻译思想的“民主性”和独特语境,其翻译家身份通过翻译文本来真实构筑。

### 三、翻译家的文化身份建构

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译介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一个译者在借由他者文化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过程,在此间由文学史、文化史、美学、语言学等,拓宽了译介的研究视野,更富有文学审美价值。楚图南的社会活动、知识学养构成、生存境遇之变及其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建构了他翻译家的多重文化身份,构成了他立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翻译视角和独特话语,正如他所言:“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当时青年朋友们的知识领域,鼓励他们走上的进步的道路。”<sup>[8]</sup>这突显了他一生致力拓展知识视野的译介宗旨。其特殊的学术

背景、多样的人生经历、多彩的社会阅历、多样的文本选择、精准信达的语言个性以及超然物外的价值指向,多层面地建构了楚图南的翻译家身份。再有,若从楚图南人生轨迹来看,其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总是与其参与的社会活动变迁交织在一起,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革命活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交流活动。楚图南的个人境遇受难总是与国难当前重叠,外国文学译介活动自然演化为其精神出路的思考,烙上了民族国家命运前途和思想意识的印记。形成其“积极向善,谦虚审慎”的学者型翻译家特质,与同时代的鲁迅、钱钟书、郑振铎等的外国文学译介比照而论,在同一性中又有了相异性,大致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译者之心。作为外国文学文化的译介者,楚图南如“背负着世界前驱的古代希腊的巨人,他将面对着时代和历史的残酷和黑暗,也将咀嚼和吞咽了现实的人间所生长出来的苦涩的桑叶,并以这吐出了发光的纤美的丝,来衣被了人间,而自己也往往要被人间在滚热的锅里烧焦或煮死。”<sup>[9]</sup>这种喀戎式精神就是楚图南作为译者保持着对民众的体恤,赢得了社会肯定和民众尊重,实现了翻译文本审美主题与知识传播的践行续发性。二是智者之思。楚图南在《枫叶集》序言中表达了对译介文本选择的思考:“选择欧美人所作诗歌,命之曰枫叶集。这不是要纪念严冬的霜雪,乃是要说明霜雪在生命上所刻下的鲜艳的痕迹,只是使生命增加了美丽。”<sup>[10]</sup>选择欧美文学进行译介的立场充分展现楚图南的文化反思,是其深思熟虑后才慎重选择的文本。作为他者优秀文学传播的文化使者,楚图南秉承着智者的文化使命与责任,在危难之际仍心系天下,反思自我民族的落后,肩负起知识传播和引领新生活的使命。以智者的身份介绍外国优秀文学文化中大无畏的精神,讲出新生活信念和绽放出生命之光,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智者。三是学者之范。翻译家正因为其对他者文化有真知灼见,能够挖掘出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并以严谨治学的学者视角来审视他者文化,兼有洞察他者文化真伪的能力。楚图南保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秉持着自己翻译作品时的审美价值,坚守了文学的本真和文人气节,成就了一个学者淡然而为的人格风范。四是师者之情。楚图南的师者之情是其现代知识分子的师

者本分，既是中外优秀文化的践行者，使其又在复杂的中国社会活动中关切着知识青年的成长。对其而言，外国文学译介饱含着给青年提供不同视角看世界的深情，将青年带入积极向善的国度，观照日常生活境遇，启示他们的人生方向，逐渐找回文化自信。

同时，外国文学译介其实是文化身份建构的途径。德国对话美学家布伯认为，自我身份的建构最重要的途径是把“自我”与“他者”置于互相参照的两极关系中，在他者的文化中反思自我文化价值，在此两极对立关系中突显出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建构自我的价值。翻译家的身份建构亦然，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从文本选择到编译手法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从早期救国激情到后期将文化视野作为修身立命的“化境”之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厚爱，植根于自我文化经验和身份认同，将他者文化经验化为“我用”，塑造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作为翻译家的楚图南其外国文学译介具备这样的身份特征：“（一）有深厚的学理基础；（二）有强烈的文化和政治倾向；（三）有文化建构的身份认同。”<sup>[11]</sup>外国文学译介的根本目的在于自我与他者族群之间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沟通互识，文学作品在自我与他者两种族群之间所承载的是文化、政治、思想互动间的影响和借鉴。外国文学译介的首要任务是“和而不同”，译者的作用则在于如何将他山之石化为我用，深厚的学术素养、充满深情的语言、深入肌理的语境成就了翻译家的文化身份。译者之心是楚图南外国文学译介的初心，构成其翻译家内在的救亡图存精神；智者之思是楚图南外国文学译介的价值沉思，构成其翻译家的文化反思；学者之范是楚图南外国文学译介的学识底蕴，构成其翻译家风范的学理素养；师者之情是楚图南外国文学译介的生命力，构成其翻译家文学理念的永恒追求。正是他善于对外国文学译介进行文化建构，能于译介他者优良品性时吸取并提炼文化经验，提升自我，铸造多重文化身份。

总之，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与其外交活动反

映了他所历经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这与其外国文学译介以及围绕这些活动展开的阐释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已同其他翻译家被载入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译介史，成为影响和推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楚图南翻译家身份的认知和阐释，往往关联到对于外国文学译介、外交活动、民主革命活动、民族教育、民族独立、人民自由，以及与世界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的思考，成就了其在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历史定位。楚图南承载了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既坚定了在外文学译介时必须遵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又传播了他族优良的多元文化精神。在译介外国文学文化方面，楚图南很好地诠释了有良知的文化使者的身份，也建构了其在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定位，成为“积极向善，谦虚审慎”的翻译家。

#### 〔参考文献〕

- [1] 楚图南. 楚图南著译选集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
- [2] 楚泽涵. 楚图南和尼采著作的翻译 [J]. 新文学史料, 2008, 30 (2): 146-149.
- [3] 楚图南. 查拉斯图如是说: 译者题记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3.
- [4] 惠特曼. 草叶集选: 译者序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3.
- [5] 谢天振. 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372.
- [6] 楚泽涵. 楚图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纪事 [J]. 新文学史料, 2013, 35 (3): 102-106.
- [7] 徐旭平, 主编. 楚图南佚文集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9: 218.
- [8] 胡君亶. 楚图南和他的译作《草叶集选》 [J]. 中国翻译, 1985, 6 (4): 2-4.
- [9] 楚图南. 楚图南文选 [M]. 北京: 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3: 530.
- [10] 楚图南. 楚图南集: 译者序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481.
- [11] 杨乃乔, 主编. 比较文学概论: 译介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18-328.